

风雨苍黄看金陵

——《南京1949》读札

□雷雨

1949年,历史长河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陆因天时、也因地利与人和,发生了重大转折,天翻地覆慨而慷,去年是这一时间节点七十周年,今年已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,却因为疫情肆虐,搅得小小寰球周天寒彻。在这样的百无聊赖忧心如焚中,看到了李伶伶的新著《南京1949》,粗看似乎给人以错了班车姗姗来迟之感,但细细读来,却真有一种好书不怕迟的相见恨晚后来居上之慨。

71年前中国大陆的历史风云、开国大典,已经有汗牛充栋的各种文本、影视呈现,即使关于此年南京,也有多种读物、影像,长江路总统府的落日余晖,扬子江畔的炮声隆隆,渡江侦察记的栩栩如生,蒋介石一干人等在中山陵前哭丧着脸的眉头紧锁,百万雄师兵临城下达官贵人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金陵残梦,这些都是多么令人熟悉的画面或桥段啊。如此似乎给人以耳熟能详近乎俗烂的题材,李伶伶还能推陈出新,写出新意?但李伶伶就是有这样的胆气与豪气,她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,磨刀不误砍柴工,成就出了这样一部《南京1949》。

这是一部聚焦南京、条理分明、鸟瞰全局的沉实之作。南京是十朝古都,美尽东南。她见识了太多的历史浩劫沧桑巨变,也见惯了太多的城头变幻血雨腥风。但1949年的南京,置放在这座城市的数千年历史上,该如何审视怎样盘点?是小处着眼管窥蠡测?是宏大叙事挂一漏万?作者通过这样的历史横断面,抓住了国民政府上层的元旦文告、总统下野、桂系粉墨登场,但蒋李仍旧彼此角力、府院依旧缠斗不休、国共或桌面上你来我往暗地里却动作频频,抓住了黄金抢运、文物迁移、教授站队分化、公职人员疏散选择、底层民众的茫然无措、大厦将倾前的世相百态、仓皇辞庙时的故作镇定,真是从容道来,不枝不蔓,沉静扎实,底气十足。

这是一部取舍得当、张弛有度、细节丰盈的耐心著作。时至今日,关于南京在1949年的诸多文献资料,当是报刊的相关报道,不少当事人的事后回忆,有关方面组织班子编写的各种读物,实在是丰富而芜杂,众多而繁复。有的自我贴金张大其词,有的囿于一隅强词夺理,有的为尊者讳故意把水搅混,有的近乎虚构说故事破绽百出。凡此种种,李伶伶搜求爬梳,精心比对,反复参酌,最终形成自己的判断,如关于司徒雷登,如关于当年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活动,如关于南京有关民主党派的活动,要真正把这些东西都梳理清楚说得明白,的确不容易呢。陈修良的丰富经历,她与沙家兄弟的关系,当时南京军警系统内的复杂错综,策动起义的多头组织,南京市政当局人物的诸多表现,甚至不少人物当年在南京的详细住址,潜伏特务荆有麟等人的垂死挣扎,都不简单化,也不脸谱化,更不妖魔化,而是耐心呈现,娓娓道来,春秋褒贬,不是赤裸裸,更不是急吼吼。这样的功夫,这样的耐心,真是很难能而可贵了,在人心浮躁热衷于短期变现急功近利的当下。

这是一部持之有故、不卑不亢、彰显史家思维的大气之作。重大历史事件,切忌人云亦云以讹传讹,也忌讳相沿成习不动脑筋沿袭旧说。如此重大历史巨变,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人身在其中,并没有很真切地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判断与把握。李伶伶展开叙述,力求避免主观臆断,也力求做到对任何一方都不卑不亢,她依据的资料、文献,都一一罗列做注,尽最大可能避免来源单一,畸轻畸重。黄金抢运,文物渡海,教授南下,涉及的人物多多,李伶伶对于这些当事人,几乎不做廉价的大是大非面前的价值评判。南京解放前夕,短暂存在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维持会,用于沟通衔接新旧政权,这样的史实,以前多被遮蔽,或者大而化之。这一短暂历史空隙的新币种、新报刊、新课程,还有“外来党”与“本地党”的敏感而具体的问题,李伶伶都以史家的眼光予以裁量,登高望远,小心求证,提出己说。

《南京1949》是李伶伶在写作出版了近十本书之后的颇显整合功夫、思考功夫、表现功夫的最新高度之作,是关于南京这座城市书写的一大收获。

303

金庸小说号称“新派武侠”,但其实新中有旧,仍存旧派作风不少。至少有两种传统写法,在金庸笔下还甚为明显:一是对男主角武功来历总是百般铺陈,包括他在江湖上的奇遇、得到高人指点或秘籍、在封闭地点修炼成功之类,这是情节上的套路;一是对武打场面总是细致描摹,包括种种以古典辞藻形容的功夫和招式,这是场景上套路。

而古龙则有意识地回避了,或者说超越了这种写法。在古龙笔下,主角武功师承往往若有若无,武打场面的刻画也是以简驭繁,省略了过程,反倒予人更多想象的空间。

304

在受众那里最受欢迎,在评论家那里最受轻视,这样的人物我觉得有两位典型:柴可夫斯基,席慕容。

305

伯牙在琴声中弹出了“高山流水”,应该是最著名的中国音乐故事了。可与之比照的,有马勒的一个轶事:马勒在奥地利的湖光山色中写出了第三交响曲,有位指挥家路过他的湖滨小屋,不免远眺山景,而马勒说:“不必看了,我已将山景谱入乐曲中。”

喜多郎有首著名的曲子《丝绸之路》。又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三七



新书快递

书肆巡回使

谢其章编  
中华书局

本书是继《买书记历: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》之后,另请友人专门约稿编就的谈旧书肆、买旧书的随笔集,撰稿者有韦力、陈子善、谢其章等,多数文字乃专为本书撰写,未曾发表。本书秉持“钩沉书林掌故,叙说当日传奇”的宗旨,展现当代国人搜求古旧书的面貌,融趣味性 with 史料价值于一书。

袁殊传记

孙宝根著  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袁殊驰骋于江浙沪文艺界、新闻界和教育界,诗文俱佳,著述颇丰。然而,为主义信仰、为抗日救国,他不惜毁誉潜伏敌寇内部,身份多重、白皮红心。他凭借精到的才识与胆魄,在中共情报史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一页。晚年的他默默无闻、命运多舛,终获平反昭雪,堪称无名英雄。本书依据丰富翔实的海内外档案史料,全面展现了多面特工袁殊的一生。

朱熹:孔子之后第一儒

杨天石著  
东方出版社

作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,南宋思想家、哲学家朱熹将传统儒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。其理学思想后来成为明清时期统治思想,对现在中国人的思维还有着深刻影响。著名学者杨天石积数十年的功力,广泛研读宋明理学经典,另行发掘从日本、韩国、越南引进的相关史料,写出了这部全面反映朱熹生平 and 思想的传记。除朱熹的生平经历外,还对其在社会政治、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教育诸方面的思想成就做了深入分析。

看叶闲语

辛德勇著  
浙江大学出版社

看(kān)叶,即古书的书衣。本书收录辛德勇先生所撰写的随笔性文章13篇,类似于写在书衣上的跋文。这种形式的文章看似随意写就,却往往能体现作者的触类旁通和见多识广。

反读书记(一零七)

□胡文辉

有位作曲家赵麟为马友友(大提琴)、吴彤(笙)专门写了一首名为《度》的双弦曲,表现玄奘为取经而穿行丝绸之路。

作曲家如何理解自己的作品,如何为自己的作品命名,当然是他们的自由。像喜多郎那样,起个“丝绸之路”的名字,使作品显得有格调、有内涵,自然没问题;但像马勒、赵麟那样,将主观感受完全客观化,将自己的旋律坐实为奥地利山水或唐三藏取经,我觉得就有英雄欺人之嫌了。至于“高山流水”,本来就是古代传说而已,可不置论。

任何一种艺术体裁都有其止境。音乐可以表现抽象的情感(比如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,比如柴可夫斯基的《悲怆》,都算名副其实),但不足以表现具体的事物——而绘画则相反。

笔名之争

□钱之俊

笔者在《“余名钟书,可为天造地设”——钱钟书的名字号》(《江海晚报》2018年10月10日)中列数了钱钟书的名字号及几个笔名,言犹未尽,再补说几则。

柯灵在《钱钟书创作浅尝》(1982年11月12日)一文中提到,1946年,解放战争期间,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,下令实行“警管区制”,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进入百姓家。其目的是“防共”又不便明说,就宣称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,并非他的独裁。这自然引起人们的反感。《周报》就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“围剿”,请一批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撰文反驳,针对这种谎言进行揭穿。钱钟书、李健吾、傅雷、乔冠华、戈宝权等人在列,钱钟书用的是化名“邱去耳”。(《百年悲歌》,第60页,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)虽然一些传记也采用了这则信息,但这实际上是个误传。这个“邱去耳”并不是钱钟书。“邱去耳”所撰时评开头说:“笔者虽然曾经在英国住过六年”,钱钟书在英国留学只两年,他写文章也从来不用“笔者”。倒是这篇时评之后的四周,1946年6月15日第41期的《周报》刊发了一组题为《十五天以后能和平吗?》的时评,作者有钱钟书、杨绛,未易姓化名。

范旭仑先生近来考证出钱钟书极少使用过的几个化名,引起热议。1929年1月,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刊行一册的同人杂志《国光》,发表了一篇署名“樗枏”的札记文章《笔语》,范先生认定该文是少年钱钟书以读书笔记董理而成。但他不明白钱默存化名“樗枏”的用意。樗枏,凶兽、恶人,“楚以名史,主于惩恶”。笔者以为,“樗枏”谐音“桃坞”,乃默存先生就读过的中学之一苏州桃坞中学校名矣,有怀念之义。也有人引明末小说《樗枏闲评》为例,言“樗枏”为“闲评”之代称。《樗枏闲评》之“樗枏”应是史书之意。《孟子·离娄》:“晋之乘,楚之樗枏,鲁之春秋,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,其文则史。”楚国的史书为《樗枏》。

又,范先生文章指出,钱默存在赵景深编的《俗文学》周刊发表论小说的札记,署名“全祖援”,亦难索解。同时的题名 Small Hours in An Attic or Noctes Atticae 笔记册,署名 C.S.Ch' ien,又用汉字标名“蜩叟”,也莫名其妙。游戏三昧,参悟匪易。(范旭仑《钱钟书十八岁署名“樗枏”的一篇文章》,《中华读书报》2020年4月29日)青岛大学张治博士猜测,钱钟书因爱读《西游记》,太喜欢孙悟空了,或者和他小时候研究过的古生物学历史有关,猿、援、蜩三字相通,“蜩善援”也(《说文》)。(转自张治微信2020年4月30日)澳门大学龚刚教授说:“吾以为,倘考诸钱氏少年时恃才学而倨傲,拟春香而闹学之脾性,则三别名之疑不难解。‘樗枏’(音如桃兀),别名傲狠,四凶之一,子泉老先生应不会用此笔名,却正合中书君彼时心气,既傲且狠。蜩,善攀缘之兽。蜩叟、全祖援二笔名,戏拟何绍基、全祖望名号,皆有以攀缘为宗之意。亦与中书君好《西游记》之趣尚相通。”(转自龚刚微信2020年4月30日)